



遂使已湮得再显

《永乐大典》收录有上自先秦、下迄明初的七八千种古代典籍，且对所收文献甚少修改，堪称“典籍渊藪”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诸多珍贵典籍相继亡佚，明万历年间重修《文渊阁书目》时，大典所收之书已“十不存一”；清康熙年间徐乾学修《一统志》时，所存更是“寥寥无几”。也正因此，《永乐大典》作为“佚书渊藪”的价值日益突显。自明代中期至今，不同时期学者的辑佚工作从未停止，特别是清乾隆年间纂修《四库全书》时达到高潮。

早在明隆庆年间，高拱、张四维等人参与重录《永乐大典》，张四维就从中辑出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和《折狱龟鉴》二书。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辑宋以来诸公案牘判语，分类编次。现有南宋刻本（残本）和张四维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的明隆庆三年（1569）盛时造刻蓝印本传世。《折狱龟鉴》是南宋郑克编撰的案例故事集，因五代和凝父子《疑狱集》未尽详备，遂采摭正史、传记、墓志、笔记中有关侦查破案、司法鉴定、辩诬雪冤、审断疑狱等案例，补苴遗缺，分载于20门类，如免决疑，如鉴烛物，成为判案决疑的一面镜子，有明辑本、四库本传世。



明·吕纪 吕文英 竹园寿集图（局部） 故宫博物院藏



全祖望

《永乐大典》的真正利用是从清前期才开始的，最早认识到这部典籍价值的是徐乾学、全祖望和李绂等人。清雍正年间，大典副本从皇史宬搬至翰林院，他们破天荒地得到阅读大典的机会，发现其中许多是“世所未见之书”，“或可补人间之缺本，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……不可谓非宇宙之鸿宝也”。于是相约每日读二十卷，把要辑的几种书标出来，另由四人抄写。由于卷帙浩繁，这项工作不是个人所能承担的，到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，无法继续下去，但他们已辑出《周官新义》《学易蹊径》《春秋义宗》《尚书讲义》等十余种典籍。



清·徐扬 京师生春诗意图 故宫博物院藏



清·佚名 鹿祺明吟阁图像 故宫博物院藏



清·郎世宁 金廷标 乾隆帝写字像 故宫博物院藏

清乾隆年间开《四库全书》馆时，安徽学政朱筠奏请“校《永乐大典》，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，辑之”，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，并专门成立了“校勘《永乐大典》散篇办事处”，开始时人员为30人，后又增加9人，著名学者戴震、邵晋涵、周永年等参加了这项工作。到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，共辑出经部66种、史部41种、子部103种、集部175种，总计385种4946卷。如西晋杜预的《春秋释例》、查考唐人世系及生平传记的林宝《元和姓纂》、后来列入“二十四史”之一的薛居正《旧五代史》、研究南宋初年历史的重要史料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、宋代医学名著《博济方》《伤寒微旨》、著名的目录学著作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等，依靠这次辑出，才得以流传下来。

邵晋涵与《旧五代史》

邵晋涵（1734—1796）字与桐，浙江余姚人。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进士，经刘统勋荐入翰林，入馆编修四库书。他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佚书多部，以《旧五代史》最为著名。

《旧五代史》又名《五代书》。梁唐晋汉周书，北宋初年由宰臣薛居正领衔编修，取材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代实录，又以范质《五代通录》为蓝本，历时十八个月修成。其后八十年，欧阳修私撰了一部《五代史记》，为区别二书，称前者为《旧五代史》或“薛史”，后者为《新五代史》或“欧史”。《旧五代史》至金代渐湮不传，乾隆时此书已佚。邵晋涵从《永乐大典》各韵中所引“薛史”，甄录排纂，会粹编次，得十之八九，又旁采《册府元龟》《太平御览》《资治通鉴》等数十种书籍，哀然成编，共一百五十卷，使《旧五代史》晦而复彰，散而复聚。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刊印版本，成为正史“二十四史”之一。



乾隆御笔《题旧五代史八韵》

邹炳泰与《直斋书录解题》

邹炳泰（？—1820）字仲文，江苏无锡人。清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入《四库全书》馆，充纂修官，先后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佚书17种，尤以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为世推重。

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是一部私人藏书目录，与《崇文总目》、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、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并称有宋一代四大目录学专著。原本56卷，分53类，共著录图书3039种，51180卷。书中解题介绍作者生平，撮举每书要旨，考辨谬讹，为目录学著作典范。该书未能雕版梓行，后逐渐散佚。邹炳泰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22卷，校纂成编，列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又以武英殿聚珍版印行，购者珍如星凤。是书虽有残缺，然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：“古书之不传于今者，得藉是以求其崖略；其传于今者，得藉是以辨其真伪，核其异同。亦考证之所必资，不可废也。”



清·叶芳林 九日行庵文宴图（局部）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

继四库馆臣对《永乐大典》进行大规模辑佚之后，嘉庆、道光时期纂修《全唐文》及续修《大清一统志》，再次对《永乐大典》进行辑佚，这是清代官方对《永乐大典》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辑佚。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，下诏于文颖馆旧址编修《全唐文》，馆臣除辑录唐代佚文外，复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佚书遗篇甚夥，今天可考者有50种左右，其中以徐松辑佚的《宋会要辑稿》最为著名。嘉道以后，小规模民间辑佚活动兴起，文廷式辑录过《元高丽纪事》《宋状元及第图》《中兴政要》《经世大典》等，缪荃孙辑有《曾公遗录》《顺天府志》等。

徐松与《宋会要辑稿》

徐松（1781-1848）字星伯，直隶大兴（今北京）人，嘉庆十年（1805）进士，后入《全唐文》馆，任提调总纂官，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许多佚书，较为重要的有《宋会要辑稿》《中兴礼书》《续中兴礼书》《河南志》等，都是超过百卷的大书。

宋代很重视编纂会要，前后共十余次，但多未刊行。元灭南宋以后，稿本北运，成为纂修《宋史》各志的依据。因此，《宋会要辑稿》成为研究宋代典章制度必备的工具书。



缪荃孙

缪荃孙（1844-1919）字炎之，又字筱珊，晚号艺风老人，江苏江阴人。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、校勘学家、目录学家，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，也是国家图书馆第一任馆长。光绪二年（1876）进士，任翰林院编修，从事编撰校勘十余年，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《曾公遗录》《中兴战功录》《顺天府志》《泸州志》等书。



清末民初，欧风东渐，随着近代图书馆的兴建，皇家图籍深幽琼阁，藏而不传和旧式藏书楼聚散易，重藏轻传的观念被打破，图书是社会公器，归于公藏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，学风丕转，不少学者和学术单位对《永乐大典》的研究与搜残存佚工作为功尤巨，成果斐然。20世纪30年代，在袁同礼、赵万里等带动下，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清点核对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发现其中若干种《永乐大典》辑本与现存《永乐大典》原本文字有出入，于是将《永乐大典》辑佚工作列入工作计划中，先后辑出佚书达二百余种，但大多没有刊行。此外，成绩比较突出的还有傅增湘辑佚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，王国维辑补《水经注》，唐圭璋编撰《全宋词》《全金元词》，张国淦《永乐大典方志辑本》，桑贵明辑成《四库辑本别集拾遗》等等。

赵万里

赵万里（1905-1980）字斐云，别署芸龕（ān）、舜龕等，浙江海宁人，著名版本目录学家。早年求学于东南大学中文系，从吴梅研究词曲。1925年任清华学校（清华大学前身）国学研究院助教，师从王国维习史学、文学、金石、戏曲、目录版本。1928年转往位于北海公园的北京图书馆任职，1929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采访组组长和善本部考订组组长，支持袁同礼收集《永乐大典》的工作，想方设法搜集国内外现存的《永乐大典》，使国家图书馆藏本数量明显增长。他采用《永乐大典》佚文和前人诗集文集，校辑补遗成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。20世纪30年代，馆内清点核对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，发现其中若干种《永乐大典》辑本与现存《永乐大典》原本文字不一致，于是赵万里把《永乐大典》辑佚工作列入工作计划，先后辑出《陈了翁年谱》《薛仁贵征辽事略》等珍贵佚书208种。1965年，他将家藏2册《永乐大典》捐献国家。

